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语言与 民族物质文化史

张公瑾 主编

民族出版社

Y U Y A N Y U

M I N Z U W U Z H I

W E N H U A S H I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语言与 民族物质文化史

张公瑾 主编

民族出版社

Y U Y A N Y U

M I N Z U W U Z H I

W E N H U A S H 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张公瑾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4

ISBN 7-105-05030-6

I. 语… II. 张… III. 少数民族-民族语-关系
- 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531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19.8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目 录

- 1 物质文化史在语言中的积淀 (1)
- 2 中国稻作的起源 (10)
- 3 壮侗语族诸族的稻作文化 (23)
- 4 “雉田”与古越人的谷田文化 (46)
- 5 农作物的族际传播 (50)
- 6 “涯密”、“密唧”与竹筒饭和
啖鼠文化 (67)
- 7 蒸馏酒的出现和传播 (73)
- 8 茶由南向北的传播 (86)
- 9 茶的古称“檟”、“皋卢” (97)
- 10 “橄榄”语源 (108)
- 11 “干栏”的语源 (113)
- 12 南方少数民族的弓弩与枪炮 (127)
- 13 我国纺织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137)
- 14 少数民族的铸造文化 (154)
- 15 壮语地名与古代壮族村寨 (162)

16	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	(172)
17	渔猎采集文化的变迁	(223)
后	记	(253)

1 物质文化史在语言中的积淀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因素积累起来的综合体系。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有可能通过语言材料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探索其起源、传播和演变的踪迹。哪怕有些文化现象在历史的积淀中已被湮没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仍有可能通过语言的重建，恢复古代语言的状况，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因此，历史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格里姆说：“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①

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最基础部分，往往在语言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记。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过去主要依靠文献的记载和地下发掘的实物，例如我们知道葡萄、苜蓿、石榴是汉代从西域传进来的，因为葡萄、苜蓿的传入最早有《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石榴的传入最早有《博物志》的记载。但很多历史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并不见有文献记载，或者从前有过记载，但这样的古籍文献没有能保存下来，也就无法考证了。同样，我国稻米起源可推到距今七千年前，因为有河姆渡出土的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堆积为证。后来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中又发现稻谷遗

^① 格里姆：《论语言的起源》，见兹维金采夫编《19世纪和20世纪语言学史：概要和摘录》，俄文版第1册，第61页，莫斯科，1962年。

存，于是这个时间又可以往前推移到一万多年前。但地下发掘的材料总是有限的，有许多物质文化的成就并没有从地下发掘的材料中发现，或者最早的文物遗存已经找不到了，发掘出来的是比较后期的，那同样难以推断其起源和传播，这样就不得不求之于别的途径。例如从远古传承下来的神话、传说来寻找历史实际的影子。但神话传说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特别是断代的难度太大，难以作为确凿的证据，于是就可以求之于语言材料。由于语言材料的非人为性质，又由于有历史比较法和语言年代学等比较科学的手段，语言材料就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可靠的证据。

语言材料对研究物质文化史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某种物质文化的起源；第二是某种物质文化的传播过程；第三是某种物质文化本身的演变或演进的情况。其实，物质文化史就是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而这三个方面都能通过语言进行考察和探讨。

现在我们先从壮侗语族中的“水田”一词说起。这个词在壮语、布依语、傣语西双版纳方言中都作 na^2 ，在傣语德宏方言中作 la^2 ，侗语作 ja^5 ，仂佬语作 $ɣa^5$ ，水语作 $ʔɣa^5$ ，毛南语作 $ʔja^5$ ，黎语作 ta^2 。8 个民族的语言中，“水田”一词都有对应规律，它们是一个同源词。这说明这些民族的祖先——古代百越民族在分化为不同民族共同体之前，早已有着共同的农业生活。而且，它们种植水稻的历史，至少可以确定在秦汉之前若干世纪。壮侗语族各民族属于平原丘陵农耕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考古学和农业史已逐渐证明他们是稻米的最早栽培者，现在从“水田”一词的分布来看，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旱地”一词。这个词在傣语中叫 hai^6 ，在同语族其他语言中，除黎语叫 pho^3 稍为特殊，尚待研究外，壮语叫 $ɣei^6$ ，布依语叫 zi^6 ，侗语叫 ti^6 ，水语叫 $ndaai^5$ ，互相间也都有对应规律，可见种旱稻也起源很早。这是因为最初

把野生稻培植为驯化稻，其中曾经过种旱稻的阶段。“旱地”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因为东汉（25—220）袁康所撰《绝越书》中记载吴越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古越人的语言有“莱，野也”（见该书“吴内传”），“旱地”叫“莱”与傣语旱地古音 rai^6 相近，现今泰国的泰语也还这么叫。这说明种植水稻和旱谷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共同生产活动，其时代应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这是通过几种语言的词汇比较揭示古代文化图景的一种情况。

另外，与水田相联系的还有一个词“田埂”。这个词在壮侗语族各语言中没有相同的词源，它在壮语中是 hen^2 ，在侗语中是 tan^1 ，在毛南语中是 fan^5 ，在黎语中是 $hjon^1$ ，互相间没有对应规律，不是同源词，但它在傣语两种方言中，西双版纳方言为 te^2 ，德宏方言为 te^2 ，两者互相对应，是傣语的一个固有词（在与傣语关系密切的南部壮语中也有相似叫法）。这说明“田埂”的产生比“水田”要晚，是壮侗语族各民族分化之后才产生的。它应是农村公社产生之后水田要由农户分块耕种才有的词。在傣族历史上农村公社产生和发展时期是在秦汉到唐宋之间。这个词在傣语两个方言中有共同来源，说明在那个历史时期云南西部和南部的傣族先民，在经济生活上是打成一片的，而那个时期傣族与壮、侗、毛南、黎等民族已经分化，互相间的联系已减弱了。这是通过词汇分析揭示其文化图景的又一种情况。

由此我们知道，壮侗语族各民族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就已经种植水田和旱地了，而在秦汉至隋唐之间的农村公社时期已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私人占有的分田耕作制度，耕作方式也从粗放型逐渐向精耕细作型转变了。

现在我们以壮侗语族的同源词“水田”为起点往上推，再来考察这个词的更早的起源。从壮侗语族各语言中“水田”的不同读音，应用历史比较方法，可以构拟出壮侗语族各语言的“田”

字的原始形式为 nja^2 。很显然，这个 nja^2 与古汉语的“田”字不会有什么同源关系，而“田”字的本义也与“田地”的“田”字无关。而是一个动词，是“田猎”即“打猎”的意思，如《易·师卦》“田有禽”，虞注“田，猎也”，即猎取飞禽的意思。后来，随着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田”字又转化为“种田”的意义。《说文》说“树谷曰田”。到了《释名》，“已耕者曰田”，这个“田”字才名词化，成了现在意义上的“田”字了。那么，壮侗语族语言中这个 nja^2 与古汉语中的什么字有同源关系呢？看来，古汉语中的“洳”字与此有关。“洳”今读 ru （这是汉语拼音），上古音为日鱼切，郭锡良构拟作 nia ，按郑张尚芳的构拟系统，则构拟为 nja ，这个字按《诗·传》解释，是“河旁低湿地”，河旁低湿地种上庄稼，就是“田”了。那么汉语中的“洳”字与壮侗语族语言的 nja 应该是一个同源词，后来，汉语“洳”字逐渐废弃不用，而今只在“沮洳”（“泥沼”之意）一词中保留一点古老的痕迹，而在壮侗语族语言中，则演变为现在“水田”之意，这是这个同源词在后来分化的情况。

如果再从“洳”字往上追溯，那么，藏语中有一个 na ，意为“水草地”，彝语（云南武定）有一个 $mi^{33} ne^{21}$ (1)，意为“水泡地”。水草地与水泡地接近，彝语 ne^2 又与藏语 na 接近。这两种语言都同属汉藏语系。藏语和彝语的这个词与壮侗语族语言的 nja 、汉语的“洳”可信有同源关系，可以推测，这个词最早在畜牧时代，意思是“水草地”，从“水草地”到“水泡地”到“河旁低湿地”，是三个非常接近的土地形态，它们有共同的称呼是不奇怪的。这样，对于壮侗语族语言中“水田”一词的来龙去脉，大体可以找到从水草地、水泡地、河旁低湿地演变为水田这样一条发展的线索，同时，通过这样的比较，也对古代土地形态

变化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①

亲属语言中同源词的比较，对语言学的本来意义是为了确定对应关系，构拟古音，并了解一个词或一组词的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而对文化研究来说，它可以揭示一种文化现象的起源和演变情况，这应是历史语言学对古代史研究的贡献。

上面这个例子是关于某种物质文化的起源的考证，现在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的情况，即从语言考察物质文化传播过程。

我们都知道，丝绸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因此，“丝”字俄语中是 шёлк，古冰岛语是 silki，丹麦语和瑞典语是 silke，古英语是 siolue，中古英语是 selk。从这个词中，我们看到了古代丝绸从中国经东部斯拉夫人再传到北欧，再到欧洲诸国的经过。^②

现在再看国内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壮语、布依语和傣语中的“酒”字，三种语言都称酒为 lau³。lau³与“酒”读音差别很大，但实际上 lau³是汉语“酒”的借词，而且时间下限不晚于汉代。这个词的传播过程相当复杂，下面一步步来说明。

首先，从汉字形式来看，“酒”以“酉”得声，两者是谐声字，在古代不仅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意义也是相通的，《释名》即释“酒，酉也”。而“酉”字在傣语中读作 lau⁴，与傣语“酒”字的读音 lau³相近，只是声调略有差别。可见这两个字是同时传到傣语中的。

其次，“酉”字有一个好处，它是处在十二地支的系统之中。

① 此处关于“迦”字的推测及藏语水草地材料，是郑张尚芳先生提供的，武定彝语材料是朱崇先先生提供的，特此说明并致谢。

② 前苏联语言学家阿巴耶夫在《印欧语历史比较研究》一书中有一章“论词源研究的原则”，其中他反驳了俄语 шёлк 借自日耳曼语的观点，指出日耳曼人不可能早于东部斯拉夫人接触丝及其名称，他说：“很显然，应该是北欧人从俄罗斯人借用了丝的名称，而不是相反。现在这个观点已被多数人所公认了。”

十二地支传入傣族地区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年代，这就是汉代，因为傣语中的十干十二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中古汉语的借词，而是上古汉语的借词。另外，傣语称十干十二支为十母十二子，这与西汉时汉语的叫法一样，史书中有“十母十二子”的说法，《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等语，而在东汉以后，就不再有以母子称干支了，可见傣语借入“酉”字的时间最可能是在西汉时期。傣语和汉语中“酉”字读音既与“酒”字相同，可见傣语的“酒”字也是一个西汉时的借词。

第三，“酉”字在韵图中是喻母四等字。喻母四等字在上古属定纽，读作 *d 声。d- 转读为 l- 在很多语言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例如“阳光”在壮语和布依语中读 diŋ⁷，在海南临高话中读 liŋ⁷，“星星”在傣语西双版纳方言中读作 daau¹，到了德宏方言中就读作 laau⁶，可见，以 d 为声母的“酉”字到了傣语中转读为 l 声母，是符合一般的语音变化规则的。

第四，“酒”在中原地区发明的时代很早，在《诗·大雅》“既醉”篇中，已记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可见诗经时代已有酒了。《战国策·魏》二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是说夏代已有酒了。那么，到汉代酒传入傣族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当时所制的酒，还不是蒸馏酒，而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甜酒。这种酒也能醉人的，所以禹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第五，中原地区在有了蒸馏酒之后，原来甜酒的酒字仍沿用下来指称蒸馏酒了。但为了区分甜酒与蒸馏酒，在汉字中衍化出“醪”和“醴”两个字，“醪”指浊酒，“醴”指甜酒，都属于甜酒类。这两个字也都出现得很早，“醴”字和“酒”字几乎同时产生，《诗·小雅》“吉日”载“以御宾客，且以酌醴”，《诗·周颂》“丰年”载，“为酒为醴，烝畀祖妣”。酒和醴音近义同，都

指甜酒。醪字出现稍晚，始见于《史记·袁盎传》，估计是为区别酒的清浊程度不同而产生的一个词。醪字现在的读音为 *lao*，与壮、布依、傣语中酒的读音完全相同。壮、布依、傣语中的 *lau*³ 现在也兼指甜酒和蒸馏酒，它们可能直接借自汉语的醪字，也可能与汉语中的酒字沿着相同的音变和义变轨迹演变而来，而今与汉语的醪字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了。

以上语言学的考证，清楚说明壮、布依、傣族的酒是从中原传入的，而且其时间早至汉代。这是以语言材料说明物质文化传播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现在再讲第三个方面的情况，即语言材料对研究物质文化本身的演变或演进情况的帮助。这方面要更多地依赖文化史研究成果的互证。

上文说到“酒”原指甜酒，后来有了蒸馏酒之后又指蒸馏酒，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即一个词的意义会随着物质文化本身的演变而发生变化。这与一般语言学概论上讲的词义的演变基本上是同一回事，例如汉语中“枪”字原指标枪、红缨枪一类的旧式武器，后来发明了手枪、步枪、机关枪，就指能发射子弹的武器了。这叫词义的更换。再如“金”字，原指一切金属，现在专指“黄金”，这叫词义的缩小。50年前罗常培先生已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他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写到英语词 *pen* 来源于拉丁语的 *penna*，原意是“羽毛”，到了古代英语里，*pen* 的意为“鹅毛笔”，如今笔的质料改变了，就指“钢笔”。^① 其实现在还用来指铅笔、圆珠笔。*pen* 一词的演变史其实就是“笔”的进化史。另外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举了一个时代特征更为鲜明的法语词 *cassette*，这个词在18世纪指贵妇人用来装首饰用的小首饰盒，反映的是贵族社会妇女的生活；到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3页，国立北京大学出版，1950年。

19 世纪词意变成了装摄影硬底片的干板盒，反映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到 20 世纪又赋有第三种意义，指的是盒式录音带，是电子科学发展的新产物。^①这也是从词义的演变来看文化的变迁。但这些例子都是以文化史已有的知识为依据，就是说，物质文化的历史情况是知道的，词意变化的情况也是知道的，它们没有揭示更多的东西。我们的目的则不同，我们要通过考察词意的变化来探讨未知的物质文化变化的历史，这方面，词意演变的研究就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现在可以汉语中的“竹”字为例。“竹”字现在的意义就是“竹子”，但汉语中有一个成语“罄竹难书”，为什么这里用得上一个“竹”字呢？细察其来源，是因为汉族古代字是写在竹简上的。再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学习要管，思想也要管”的“管”字，意思是“管理”、“经管”，这个字为什么与中空之圆棍的“管子”的“管”是同一个字呢？现在一般人已经感觉不出“管理”的“管”字与“管子”的“管”字之间有什么联系了，但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来源。因为古代钥匙的形状是中空的管子，所以钥匙就叫“管”，而谁掌握了钥匙，他就被赋予管理的权利。《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有“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一句，就是让我掌握北门的钥匙，同时也就给了我管理北门的权利。从现代“管”字之歧义可以考证出古代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以及钥匙的形状来。这都说明，语言中保存着生活中已经消失了的東西。现实语言就是珍贵的历史证据。

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中曾举了一个希腊文中的词 *nomos*。这个词的词意演变是这样的：最先的意义是“草原”、“牧场”，反映的是游牧时期的生活；后来的意义为“居留”、“住处”、“分配”，住处与分配联在一起，这时已建立了农村公社

^① 陈原：《社会语言学》，第 258～259 页，学林出版社，1983 年。

了；最后的意义是“习惯”、“风俗”、“法律”，这是在农村公社制度消失之后，原来的词意失去了依附，然后词意扩大了。拉法格说：“这个词的不同意义表明，一个游牧民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变为定居的、农业的民族，并且得到了法律这个概念。法律无非是习惯和风俗的规章化。”^① 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说明从一个词源的考证可以了解物质文化的变迁以至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的演变过程。语言学成了物质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现象，我们还可以说，语言也是一座文化的宝库。透过语言揭示物质文化起源和演变的历史，将可以补其他学科研究手段之不足，为人类往日的文明展示更加真实的图景。

^① 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2 中国稻作的起源

水稻栽培起源地的探讨，是国际学术界常说常新的话题。中外许多学者主张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栽培稻起源地之一，较流行的有“云南说”、“浙江余姚河姆渡说”、“长江中游说”、“长江中游与淮河说”以及“华南说”。不少学者在论证这一问题时运用了语言学材料，或者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加以论证。例如游汝杰（1980、1983）和周振鹤、游汝杰（1986）曾以侗台语族的台、侗水两语支材料为证，指出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以及缅甸掸邦是亚洲稻作的起源地。这一说法较有影响，为不少论者所引用。但是仅包括台、侗水两语支的原始侗台语至今约只有两千多年，利用这些材料最多只能说明三千多年前的问题，这远比一般所认为的中国稻作起源在七千年以上的时限要晚得多（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七千年左右，其稻作水平已经相当高，不可能是早期形态）。仔细研讨语言学材料，我们发现，侗台语族（包括黎语支和仡央语支）、南岛语系及朝鲜语之间的“水稻”、“稻米”二词对应较整齐，苗瑶语似乎也与上述语言有关系，南亚、藏缅内部分歧较大，不能构拟各自语族一级的原始形式。汉语的“稻”来源不明，表示“稻”的另一词“稌”似乎与部分侗台语言“糯稻”有关。

由于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同源关系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

定, 还有学者初步论证了南岛语和朝鲜语的发生关系,^① 因此上述语言“水稻”、“稻米”的相似性似乎可以从同源的角度去理解, 尤其是侗台语和南岛语。如果说侗台、南岛、朝鲜语的“稻”有同源关系, 那么在原始侗台—南岛(甚至包括朝鲜)语时期, 操这些语言的先民已经盛行稻作, 时间当在六千年以上(一般认为南岛语系在六千年前左右开始分化)。这是迄今为止从语言学上能追寻到的最早的稻作起源时间。

一般认为原始侗台人、南岛人是半渔半农的原始居民, 他们的起源地在我国的华南(或者连带到中印半岛东部地区)、东南沿海一带(或者说南岛人先从中国东南沿海进入台湾省, 然后扩散到太平洋广袤地区)(张光直 1987, 贝尔伍德 1994)。因此, 从语言学上看, 华南、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栽培稻起源地, 或者说起源中心。在我国古代诸原始人群中, 侗台、南岛语先民率先在其家园学会了引种当地的野生稻(华南是中国野生稻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发明、掌握了栽培水稻的技术。

邓晓华(1993)提出南岛、侗台语“米、稻、饭、糠”四词有交叉同源关系, 并联系考古资料推断“创造稻米文化的主人应是古越人”。这一主张我们同意, 此问题只是书中一小节的一个层次, 作者未展开论证, 此外也仅利用了台、侗水、黎语支材料, 未使用更有说服力的仡央语支材料。但作者推断稻作文化为古越人在长江下游发明, 后传播到古越人居住的东南沿海, 这一点我们不敢苟同。

这里主要通过论证侗台、南岛语“水稻”一词的同源关系来说明栽培稻的起源地问题, 其中以较多的新近掌握的仡央语言材料来说明, 在这个问题上, 仡央语言正像白保罗当年所指出的(他称黎语、仡佬语、拉基语、普标语为“卡岱语”, 当然他未掌

① 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握应划入这个语团的布央、木佬语材料，拉哈语是他在 1975 年出版的著作才利用上的）充当了联系南岛、侗台语的纽带（Benedict 1942），假如没有仡央语支作证，南岛、侗台“稻”一词的关系仍然是很模糊的。

侗台、南岛、朝鲜语的“水稻”（植株、稻谷）和“稻米”二词当以南岛的形式最为古老，可拟定为原始侗台—南岛语的代表形式：
 * pajəy “水稻（植株、稻谷）”；* bəras “稻米”。这两个词在现代南岛诸语言中形式相当一致，演变转轨痕迹很清晰。例如：原始南岛 * pajəy “水稻” > * ja（台湾省巴布萨、东部鲁凯语“米饭”），* pagay（原始印尼语），padi（马来语），tsimpəri/fari（Hova 语“野生稻”），* pajay（台湾省东部南岛语、邹语群、泰雅尔语群共同形式，赛夏语“饭”）。原始南岛 * bəras “稻米” > 马来—印尼语 bəras，赛德语 bəras，凯他噶兰语 pulat，菲律宾阿格达（Agta）语 baggat，巴则海语 mulasi，卑南语 vuras，布农语 pa，百宛（排湾）语 vat，邹语 pai，越南拉德语 braih，回辉话 phia¹¹。

“稻米”一词在从原始南岛语到现代南岛诸语的发展中部分表现为单音节词（布农、百宛、邹、拉德、回辉），这是音节紧缩和音节脱落的结果。拉德语中由于头音节元音脱落而紧缩为复辅音声母单音节形式，布农语和百宛语次音节脱落，仅保留辅音韵尾，邹语、回辉话保留头音节，次音节脱落，但邹语 -i 韵尾也可能来自辅音韵尾 -t（由更早期的 -s 变来）。

这两个词在侗台语和朝鲜语均表现为单音节形式，可能是先由早期的双音节词紧缩成复辅音声母单音节形式，有的语言现在还保留复辅音，韵尾 -s 塞化成 -t，后来又变 -n 或消失，-s 也可能在一些语言变成 -l，后变 -n 或消失，其演变基本情况与布农等南岛语的发展相似。

先看“稻米”及与之相关的“水稻”、“稻谷”、“饭”，与南岛语 * bəras（亦假设为原始侗台—南岛语的原始形式）“稻米”